

《义勇军进行曲》是怎样传唱到街头巷尾,成为鼓舞民族信心的最强音?

歌声唤醒民众,唱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今时今日,恐怕没人会不熟悉《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

但在《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1935年,电影并不是一种能为大众所普遍享受的文化艺术。作为《风云儿女》的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是怎样传唱到街头巷尾,在大江南北传开,成为鼓舞民族信心的最强音?

带着这个疑问,我们找到了青年时代致力于国歌传唱、后来曾出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的刘良模的长孙、和祖父共同生活过25年的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新,一段时代青年歌咏救亡的故事,浮出历史的水面。

将大众团结动员起来,把革命的热情传递出去

1934年冬,刘良模在上海四川路青年会办起上海第一个民众歌咏会,不收任何学唱费用,但需要学会后教别人唱。

出乎意料的是,作为发起者,刘良模并非音乐专业出身。“他和我讲的时候,我都有疑问,你一个学社会学的,怎么唱歌去了?”刘新说,祖父告诉他,那个时代的中国,和如今完全不同。他们接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都明白,将来必有一战。那么眼前的迫切需要,就是要将群众动员起来。

“应该做的事情,他们就要去做。”刘新说。本身任职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刘良模,有教群众唱诗的基础。他想到,可以用类似的事情,将大众团结、动员起来。

刘良模教群众唱的第一首歌,是他自己用美国民歌调编的《救中国》,歌词只有很简单的几句:“救,救,救中国,一起向前走。努力啊!

努力啊!努力啊!努力啊!救国要奋斗!”

刘良模在回忆录中写道,不到半小时,群众就学会了这首歌。最开始,

大家的声音很细小,但很快响亮起来。

“不能小看唱歌,卖报的也好,人力车夫也好,洗衣工人之类的也好,他们可能不识字,但都能学会唱歌,这样



三教九流间,就能把革命的热情传递出去。”刘新说。

歌咏会发展得很快。组建之初,90多人几乎都来自青年会周边人士,但很快,歌咏会就吸纳了300多人。“一个多月后,青年会就在八仙桥,也就是今天的大世界那儿,办了第二个民众歌咏会。”刘新介绍,“两个会加起来,有近千人的规模。”

“事情不是他一个人干的,而是同志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刘新说。

随着歌咏会影响的扩大和会员人数的不断增加,为便于通知和开展活动,歌咏会按照会员的职业和工作地点分成活动小组。刘良模为各个小组选拔了练习歌唱的指导人员和负责联络工作的干事,建立起会员“民众歌咏干部训练班”,还请来冼星海等知名音乐人做指导。由此,一个正循环形成了:青年会歌咏队骨干被迅速培养成才,这些骨干又作为抗战歌咏的有生力量深入学校、里弄和工厂,向民众教唱抗战歌曲,组织歌咏会。

在这样的推动下,上海青年歌咏活动很快蔓延开来。不少仁人志士自发组织起歌咏队伍,以此唤起民众的救亡热情。

为民族解放而唱歌,每一唱句都是一个口号

在刘良模组织出版的《青年歌集》序言里,他这样写道:“我们不是为唱歌而唱歌,我们是为民族解放而唱歌。我们要用唱歌的方法来唤醒民众,组织民众。”

这就难怪,《义勇军进行曲》甫一诞生,就成为传唱的重头曲目。

“我祖父一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就非常激动,他知道这首歌一定能传开。”刘新说。理由其实非常直接朴素,因为《义勇军进行曲》够短、够容易学,也够鼓舞人心。

很快,如刘良模所料,《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的街头巷尾传开,甚至成为集会时几乎必唱的曲目。1936年1月28日,淞沪抗战四周年纪念日当天,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刘良模和歌咏团成员在成立大会上领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在救国会组织的各种活动中,作为执委的刘良模都会

带头唱《义勇军进行曲》。

同年6月14日,刘良模在上海公共体育场组织了一场约有五千人的抗日歌咏大会。

刘新说:“当时,为了阻挠这次歌咏活动,体育场举办了一场足球赛。我祖父和歌咏队,就趁着裁判吹哨休息的时间,一哄而上,占据最高处,开始唱起来。”

当《义勇军进行曲》唱响时,全副武装的军警也停下了驱赶,加入了歌咏的队伍中。

这一震撼人心的场景被当时的媒体记录下来,《申报》报道称:“每至‘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场屏息,声振屋瓦。”

这次大会的集会现场照片,如今陈列在上海的国歌展示馆内。

1937年8月青年会军人服务部成立后,刘良模成为服务部第十支部(京沪支部)的负责人,提出要在最短时间让全国人民都学会唱《义勇军进行曲》。为了教唱抗日歌曲,他走遍了天津、广西、湖南、浙江等地。

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人民之战》和其晚年出版的《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中,都提到1937年他在中国看到刘良模教唱时的场景,“刘良模完全沉浸在他的工作中了。年轻、身材修长、容颜俊秀的他,似乎一边倾听着每个人的单独地唱,并及时纠正,一边自己也不停地唱着。他仿佛有分身术:既是唱歌者,像他的听众一样,唱出每个中国人的‘最后的吼声’;又是教导有方的教唱者和听者……”

群众学唱的场景,也深深感染了爱泼斯坦。“里面大约有400个人站着唱歌。他们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学生、小文员、工匠、中小学生、报童,甚至还有拉黄包车的……他们表情严肃,学一句重复一句;然后,一起唱两句,接着唱整段。每一唱句都是一个口号,展现着他们全都想过,但却表达不出来的思想。此刻,他们长期被压抑的感情终于释放出来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林子璐 肖雅文

(来源:解放日报)

本版图片为国歌展示馆资料图

